

国学经典读本

金良年 / 译注

孟子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国学经典读本

金良年 / 译注

孟子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前 言

过去习惯将儒家思想称为孔孟之道，“孔”当然是“至圣先师”孔子，被称为“亚圣”的“孟”乃是指战国时代儒家的著名学者孟轲（约前 372—前 289 年）。他的故乡在现今山东的邹县，距孔子的家乡不远。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只为他作了一篇一百四十字的传记，其中还包括了近五十字的时代背景介绍，因此，后人对他生平的了解十分粗略。据说他的父亲名激，很早就去世了，小孟轲实际由他的母亲抚养长大。孟子在幼年很得力于母亲的教诲，“孟母三迁”的故事从汉代的《列女传》开始，后来还写进了大名鼎鼎的通俗读物《三字经》，被作为贤母教子的典范事例而广泛流传，在过去几乎家喻户晓。孟子长大后，曾“受业子思之门人”（《史记·孟子荀卿列传》，子思就是儒家宗师孔子的孙子），奠定了他对儒家学说的终生信仰。学业成就后，他像当时许多学者一样，一面设帐授徒，一面历游各国，向诸侯国君游说。他曾先后到过齐、宋、滕、魏、鲁等国，并一度担任过齐宣王的客卿，在齐国的稷下学宫讲过学。据《史记》记载，由于当时的君主不采纳他的治国主张，所以他就不再过问世务，以著作的方式阐发儒家学说，写成了《孟子》一书。但后人一般认为，今天所见的《孟子》并非出于孟子自作，它和《论语》一样，也是由他的门徒编

纂而成的,不过与《论语》稍有不同的是,其中的部分章节很可能经过孟子的亲自润饰。

现在流传的《孟子》共有七篇,约三万五千余字,据《汉书·艺文志》“诸子略”的记载,西汉时的《孟子》传本有十一篇,今本《孟子》七篇属“内篇”,另有《性善》、《辨文》、《说孝经》、《为政》等四篇为“外篇”。东汉时为《孟子》作注的赵岐认为,这四篇的文辞、风格与“内篇”有很大的差异,可能是后人的伪作(冯友兰的《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初稿》认为,外篇的题目“都是有独立意义的,因此跟七篇大不相同,可以断定它们与七篇不是同时期的作品”),所以后来就逐渐亡佚了,在《隋书·经籍志》中已不见这四篇的踪迹了。至于现在所传的《孟子外书》四篇则出于明人伪撰,早在清代就已是无可改移的铁案了。

《孟子》一书,原来只是一般性的儒家著作,不属于儒家经典之列。东汉学者王充甚至还有《刺孟》之作,对《孟子》大加挾伐。大约从唐代开始,由于儒家“道统”说的提出,《孟子》的地位渐渐抬高,孔、孟并称的提法日益增多。唐代就曾有多次要求提高《孟子》一书地位的请求,如代宗宝应二年(763年)礼部侍郎杨绾疏请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、《孟子》兼为一经,懿宗咸通四年(863年)进士皮日休请立《孟子》为学科,但唐末所刻的“开成石经”中仍没有将《孟子》列入。到了宋代,统治者正式将《孟子》升格为“经”。经南宋淳熙年间理学家的鼓吹与《四书》的编纂,《孟子》作为“经”的地位才正式固定下来,并出现了“十三经”的提法。

《孟子》与《论语》一样,也属于以记言为主的语体文,但它比《论语》又有所发展。《论语》的文字简约、含蓄,《孟子》则有许多长篇大论,气势磅礴,逻辑性强,既尖锐机智而又从容舒缓,对后代的散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当时,与孟子同时代的一些思想

家如商鞅、荀子、庄子等人都已经在写作专题短论，而《孟子》的文体仍然依仿《论语》，后人认为《孟子》一书的编纂沿袭了《论语》的体裁是不无道理的。这不仅是形式上的模仿，它与孟子自诩儒家的正统传人有很大的关系，孟子曾说过：“五百年必有王者兴，其间必有名世者”，“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，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，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，然而无有乎尔？”他虽然没有直说，但自负其传道之任的倾向是很明显的。美国学者迈克尔·H·哈特在排比人类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一百人时，把孟子列在第九十二名，并指出：“孟子的著作肯定对中国人有影响。虽然他对儒教的影响远不如圣·保罗对基督教的影响大，但是他无疑是一位有巨大影响的作家。在大约二十一个世纪中，在占人口为世界百分之二十多的国度里，到处都在学习他的思想。全世界也只有几个哲学家有过这么大的影响。”

《孟子》被列入儒家经典的时间比较晚，再加上它又有过不受重视的“前科”，因此，有关它的研究著作不及《论语》那么多，但由于它后来被列入《四书》，所以，疏释它的著述仍多于其他的儒家经典。现在我们研读《孟子》值得参考的专著有以下几种：

东汉赵岐的《孟子章句》。这是现存最早的《孟子》注，据赵岐在《孟子题辞》中的自述，他的注是“述己所闻，证以经传，为之章句，具载本文，章别其旨，分为上下，凡十四卷。究而言之不敢以当达者，施于新学可以寤疑辨惑，愚亦未能审于是非，后之明者见其违阙，傥改而正诸，不亦宜乎”。赵岐的注释比较平直，较少附会，他为各章所作的章指对后人理解《孟子》的帮助不小，而且，他的注中还保留了许多很宝贵的材料，例如，他所见到的《尚书》还不是后来真假杂糅的本子，所以，他对《孟子》引《书》的注释，对后人研究《尚书》就很有价值。清代的阮元说他的注“以较

马(融)、郑(玄)、许(慎)、服(虔)诸儒稍为固陋,然属书离辞、指事类情,于诂训无所戾,七篇之微言大义藉是可推,且章别为指,令学者可分章寻求,于汉传注别开一例,功亦勤矣”;梁启超许为汉代经师“最可宝贵之著作”,都是比较公允的评价。正因为如此,他的注一直流传不绝,朱熹的《集注》亦对它采获颇多,这些决不是偶然的。

南宋朱熹的《孟子集注》。这是宋人注释《孟子》的代表作,也是阐述新儒家(理学)思想的经典之作。宋代尊《孟子》为“经”之后,出现了一批疏释《孟子》的著述,其中比较有名的是旧题为北宋孙奭据赵注所作的疏,通行的“十三经注疏”就采用了这个注释本。这部著作其实并不出于孙奭之手,前人已基本有所论定(参见余嘉锡《四库提要辨证》),尤其成问题的是,其说解亦不很高明,朱熹就曾说该疏“全不似疏体,不曾解出名物制度,只缠绕赵岐之说”;《四库提要》也说它“皆敷衍语气,如乡塾讲章”。相比之下,朱熹的说解就显得较为精当,经学史家周予同先生曾评论说:“朱熹之于《四书》,为其一生精力之所萃,其剖析疑似、辨别毫厘,远在《易本义》、《诗集传》等书之上。名物度数之间,虽时有疏忽之处,不免后人之讥议,然当微言大义之际,托经学以言哲学,实自有其宋学之主观的立场。”(《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·朱熹》)

清焦循的《孟子正义》。这是清人经典新疏的代表作之一,如上所述,《孟子》一书向乏较好的疏,朱熹《集注》虽善,但其中杂有许多新儒学的见解,对于真正确切理解《孟子》仍嫌不足。因此,新疏之需要,除《尚书》外,就数其最为迫切了。焦循是当时著名的经学大师,以其才能是足够为《孟子》作疏的,但他的大半精力萃于易学,等到他着手为《孟子》作疏时已经垂老,书方成

便故去了。焦循说,为《孟子》作疏有十难,经前人的努力,其难已减去七八。这既是实话,也是他的自谦。焦循此书亦以赵岐注为基础,广搜清代学者考订注释《孟子》的成果凡六十余家,再加上焦循自己所作的注释汇编而成。焦循是书虽以训释名物为主,然对书中的义理也解得极为简扼允当。梁启超后来评价说,焦循“于身心之学固有本原,所以能谈言微中也。总之,此书实为后此新疏家模范作品,价值是永远不朽的”(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》)。此外,清代学者崔述的《孟子事实考》、近人钱穆的《先秦诸子系年考辨》,对孟子及其弟子的事实论考颇详,补充了孟子事迹不详的阙略,是了解孟子其人及其学派的必读材料。最后还值得一提的是,清代还有两部与《孟子》有关的重要著作,那就是戴震的《孟子字义疏证》和康有为的《孟子微》。这两部书形式上是疏释《孟子》,但都是借此阐述自己的哲学主张,对于研究他们两人的思想很有价值,而与《孟子》本身的关联倒并不很大。

本书是为适合中等水平读者阅读而编著的一个普及读本,对经文的解释大体参考赵岐、朱熹、焦循三家的注释而断以己意。每章经文除译、注外,还设有“段意”对该章的要点略作提示,其说法基本折衷前人的成说。本书的译文和段意部分曾收入笔者所译述的《白话四书》,此次撰为译注,基本依照原貌,个别地方吸收读者的意见作了修改。全书之后附有名句和概念索引,以便读者查找有关的原文。笔者水平有限,其中不可避免地会有错误、疏漏,敬请读者不吝指正。

金良年

目 录

前言	1
梁惠王上	1
梁惠王下	23
公孙丑上	50
公孙丑下	73
滕文公上	94
滕文公下	115
离娄上	136
离娄下	158
万章上	181
万章下	201
告子上	220
告子下	240
尽心上	260
尽心下	283

梁 惠 王 上

1.1 孟子见梁惠王，^①王曰：“叟不远千里而来，^②亦将有以利吾国乎？”^③

孟子对曰：“王何必曰利？亦有仁义而已矣。王曰‘何以利吾国’，大夫曰‘何以利吾家’，士、庶人曰‘何以利吾身’，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。^④万乘之国，^⑤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；^⑥千乘之国，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。万取千焉，千取百焉，不为不多矣。苟为后义而先利，不夺不餍。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，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。^⑦王亦曰仁义而已矣，何必曰利？”

【注释】^① 梁惠王：即魏惠王，名罃，前 369—前 319 年在位，惠是他死后的谥号。前 362 年，魏国将都城从安邑（今山西夏县西北）迁到大梁（今河南开封），因而它也被称为梁。 ^② 叟：对老人的尊称。 ^③ 亦：句首助词，无义。下文的“亦有仁义而已”中的“亦”则是但的意思。利：朱熹《孟子集注》（以下简称“《集注》”）云：“王所谓利，盖富国强兵之类。” ^④ 交征：朱熹《集注》云：“征，取也。上取乎下，下取乎上，故曰交征。” ^⑤ 万乘（shèng 剩）之国：具有万乘兵车的国家。春秋战国时代以兵车的数量来计算国家的实力。所谓“万乘之国”，就是能动员万乘兵车、万乘后勤用车的国家。据当时的说法，天子地方千里，能拥有万乘兵车；诸侯地

方百里,只能拥有兵车千乘。因此,“万乘之国”是天子的代称,但那时称为“七雄”的诸侯大国都已自称为王,所以时人就用此词指称强国。

⑥ 弑(shì 试):古代对在下者杀害在上者的说法。千乘之家:此处的家指有封邑采地的公卿大夫。⑦ 后:朱熹《集注》云:“不急也。”

【译文】孟子进见梁惠王,惠王说:“老丈不远千里前来,将使我国有所获利吗?”

孟子答道:“大王何必说利呢?只有仁义罢了。大王说‘用什么使我国获利’,大夫说‘用什么使我家获利’,士和庶人说‘用什么使我自身获利’,上上下下交相牟利,国家就危险了。拥有万乘兵车的国家,谋害它君主的必定是拥有千乘兵车的家族;拥有千乘兵车的国家,谋害它君主的必定是拥有百乘兵车的家族。万中取千,千中取百,不能算不多了。倘若不顾义而看重利,那不夺取全部是不会满足的。重仁的人从来不会遗弃他的亲族,重义的人从来不会不顾他的君主。大王只说说仁义吧,何必说利呢?”

【段意】据《史记·魏世家》记载,魏惠王三十五年(前335年),“卑礼厚币以招贤者,而孟轲至梁”。(清代学者崔述认为,《史记》的记载有误,孟子至魏当在惠王去世前一、二年。见《孟子事实录》)魏国在战国初年本是一个较强的国家,到了惠王统治时,正如他自己在后文中所说的:“东败于齐,长子死焉;西丧地于秦七百里,南辱于楚。”求强之心比较急切。因此,一见面就问孟子:“将使我国有所获利吗?”孟子认为,导致战国纷攘这一大变局的根源正在这个“利”上,“利”打破了延续了数百年的统治体制与社会秩序,因此,孟子针锋相对地提出了“仁义”。“仁义”既是本章的要点,也是孟子思想的大纲。司马迁对孟子的这一论点也十分赞赏,他在《史记·孟子荀卿列传》的序中说:“余读孟子书,至梁惠王问‘何以利吾国’,未尝不废书而叹也。曰:嗟乎,利诚乱之始也!夫子罕言利者,常防其原也。”

1.2 孟子见梁惠王，王立于沼上，^①顾鸿雁、麋鹿，^②曰：“贤者亦乐此乎？”

孟子对曰：“贤者而后乐此，不贤者虽有此不乐也。《诗》云：‘经始灵台，^③经之营之。^④庶民攻之，^⑤不日成之。经始勿亟，庶民子来。王在灵囿，^⑥麋鹿攸伏。^⑦麋鹿濯濯，^⑧白鸟鹤鹤。^⑨王在灵沼，于物鱼跃。’^⑩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，而民欢乐之，谓其台曰灵台，谓其沼曰灵沼，乐其有麋鹿鱼鳖。古之人与民偕乐，故能乐也。《汤誓》曰：^⑪‘时日害丧？^⑫予及女偕亡！’^⑬民欲与之偕亡，虽有台池、鸟兽，岂能独乐哉？”

【注释】① 沼：水池。 ② 鸿雁、麋鹿：朱熹《集注》云：“鸿，雁之大者；麋，鹿之大者。” ③ 《诗》：此处诗句引自《诗·大雅·灵台》，这是一首歌颂周文王德行的诗歌。经始灵台：孔颖达《毛诗正义》（以下简称“孔疏”）释此句云：“经理而量度，初始为灵台之基址也。”灵台的旧址在今陕西省郿县以东。 ④ 营：郑玄《毛诗笺》（以下简称“郑笺”）云“营表其位”，孔疏云：“谓以绳度立表以定其位处也。” ⑤ 攻：朱熹《集注》云：“治也。” ⑥ 王：指西周的开国君主周文王。灵囿：囿是畜养禽兽的场所，规模小的用于游观，规模大的用于围猎。灵台之下有囿和池沼，故称“灵囿”，下文的“灵沼”与此意同。 ⑦ 麋（yōu 忧）：雌鹿。攸：郑笺云：“所也。”伏：朱熹《集注》云：“安其所不惊动也。” ⑧ 濯濯：朱熹《集注》云：“肥泽貌。”《诗》毛传（以下简称“毛传”）谓“娱游也”。 ⑨ 鹤鹤：朱熹《集注》云：“洁白貌。” ⑩ 于：句首助词，无义。朱熹《集注》说是赞美叹词。物（rèn 刃）：毛传云：“满也。” ⑪ 《汤誓》：《尚书》篇名，商汤讨伐夏桀的誓师词。 ⑫ 时：朱熹《集注》云：“是也。”害（hé 和）：何，指何时。《尚书》原文作“曷”，义同。据《尚书大传》说，夏桀暴虐无道，大臣向他劝谏，他居然无耻地说：“上天有太阳，如同我拥有天下，太阳会灭亡吗？太阳灭亡了，我也

就灭亡了。”于是民众就说了此处所引的一段话，表示了对夏桀统治的厌弃。⑬女：通“汝”，你。偕：一同。

【译文】孟子进见梁惠王，惠王站在池边，顾望着飞雁、驯鹿，说：“贤者也以此为乐吗？”

孟子答道：“贤能者才有这样的快乐，不贤者虽然有这些却不感到快乐。《诗》说：‘灵台刚刚奠基，正在规划之中。民众赶来建造，没有几天竣工。王曰建台勿急，民众像子女为父母出力一样踊跃。文王来到灵囿，母鹿安卧不惊。母鹿多么壮实，白鸟多么洁净。文王来到灵沼，满池鱼儿跃迎。’文王用民力建高台、挖池沼，民众欢欢喜喜，把这个台称为灵台，把这个池称为灵沼，对它有禽兽鱼鳖感到高兴。古时候的君子与民众一起快乐，所以能够感到快乐。《汤誓》说：‘这太阳何时陨落？我们和你一起灭亡！’民众要与夏桀一起灭亡，他即使有高台池沼、飞禽走兽，难道能独自感到快乐吗？”

【段意】此章是说，统治者必须与民众忧乐相通，体恤下民。这样民众高兴，统治者也高兴，形成上下和谐的政治局面。否则，把自己的作乐建筑在民众的痛苦之上，这样的快乐难以持久，即使得到了也不会感受到快乐。

1.3 梁惠王曰“寡人之于国也，①尽心焉耳矣！②河内凶，③则移其民于河东、移其粟于河内，④河东凶亦然。察邻国之政，无如寡人之用心者。邻国之民不加少，寡人之民不加多，何也？”

孟子对曰：“王好战，请以战喻。填然鼓之，⑤兵刃既接，弃甲曳兵而走，⑥或百步而后止，或五十步而后止。

以五十步笑百步，则何如？”

曰：“不可！直不百步耳，^⑦是亦走也。”

曰：“王如知此，则无望民之多于邻国也。不违农时，谷不可胜食也；^⑧数罟不入洿池，^⑨鱼鳖不可胜食也；斧斤以时入山林，^⑩材木不可胜用也。谷与鱼鳖不可胜食，材木不可胜用，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。^⑪养生丧死无憾，王道之始也。五亩之宅树之以桑，五十者可以衣帛矣；^⑫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，^⑬七十者可以食肉矣；^⑭百亩之田勿夺其时，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；谨庠序之教，^⑮申之以孝悌之义，^⑯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。^⑰七十者衣帛食肉，黎民不饥不寒，^⑱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。

“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，^⑲途有饿莩而不知发，^⑳人死则曰‘非我也，岁也’，是何异于刺人而杀之曰‘非我也，兵也’。王无罪岁，斯天下之民至焉。”

【注释】① 寡人：朱熹《集注》云：“诸侯自称，言寡德之人也。” ② 焉耳：赵岐《孟子注》（以下简称“赵注”）云：“焉耳者，悬至之辞。” ③ 河内：相当于今河南境内的黄河以北地区，《史记·晋世家》：“当此时晋强，西有河西，与秦接境，北边翟，东至河内。” 凶：荒年。 ④ 移其民、移其粟：朱熹《集注》云：“移民以就食，移粟以给其老稚之不能移者。” 河东：指今山西省西南部，因黄河经此作北南流向，该地区位于黄河以东而得名。 ⑤ 填然：鼓声充盈的意思。古代作战，以击鼓表示进军，以鸣金（击钲，钲是一种形似钟的乐器）表示退兵。之：句末助词，无义。 ⑥ 曳（yè 叶）兵：拖着兵器。走：《说文》云：“趋也。”古代所说的走，相当于现在所说的跑；而现在所说的走，在古代称为步。 ⑦ 直：只是。 ⑧ 胜（shēng 升）：尽，朱熹《集注》云：“不可胜食，言多也。” ⑨ 数罟（shuò gǔ 朔古）：网孔细密

的渔网。赵注云：“密细之网，所以捕小鱼鳖者，故禁之不得用。鱼不满尺者不得食。”洿(wū 乌)：大的意思。又，朱熹《集注》云：“汗下之地，水所聚也。” ⑩ 斤：砍刀，古代常斤、斧连称。以时：按一定的季节。 ⑪ 丧死：葬送死者。 ⑫ 五十者可以衣(yì 艺)帛：朱熹《集注》云：“五十始衰，非帛不暖，未五十者不得衣也。”衣在此作动词用。 ⑬ 鸡豚狗彘(zhī 支)：豚是猪，彘是小猪，此处概指农家养殖的家畜。无失其时：不耽误养育的时节。朱熹认为是指在家畜繁育的季节不宰杀母畜。 ⑭ 七十者可以食肉：朱熹《集注》云：“七十非肉不饱，未七十者不得食。” ⑮ 庠序：古代的乡学。 ⑯ 申：重复、一再。 ⑰ 颁白：同“斑白”，花白头发的老人。负戴：古代用人力搬运重物的两种方式，负指背在背上，戴指顶在头上。 ⑱ 黎民：老百姓，朱熹《集注》云：“黎，黑也。黎民，黑发之人，犹秦言黔首也。” ⑲ 检：节制、制止，赵注云：“以法度检敛也。” ⑳ 途：道路。莩：饿死的人。发：开仓赈济。

【译文】梁惠王说：“我对于国家，很尽心了吧！河内饥荒，就把那里的民众迁移到河东、把河东的粮食运到河内去，河东饥荒时也这样。了解一下邻国的政绩，没有像我这样尽心尽力的。邻国的民众不见减少，我的民众不见增多，是什么道理呢？”

孟子答道：“大王喜好打仗，让我用打仗来作比喻。战鼓咚咚，交战开始了，战败的士兵丢盔弃甲拖着武器奔逃，有的跑了一百步才停下，有的跑了五十步就停下了。跑了五十步的人因此而讥笑跑了一百步的人，行不行呢？”

惠王说：“不行！他只不过没有跑到一百步，也同样是逃跑。”

孟子说：“大王如果知道这个道理，就不要希望你的民众比邻国多了。不违背农时，粮食就吃不完；密孔的渔网不入池沼，鱼鳖就吃不完；斧子、砍刀按季节进入山林，木材就用不完。粮

食和鱼鳖吃不完，木材用不完，就使得民众的生、死都没有缺憾了。生、死没有缺憾，是王道的开端。五亩宅田种植桑树，年满五十的人就能穿上丝绸了；鸡鸭猪狗不失时节地畜养，年满七十的人就能吃上肉了；百亩农田不误了它的耕作时节，数口之家就能没有饥荒了；注重乡校的教育，强调孝敬长辈的道理，须发斑白的人就不至于在道路上背物负重了。年满七十的人能穿上丝绸、吃上肉，老百姓能不受饥寒，做到了这些而不称王天下的还从未有过。

“猪狗吃着人的食物而不知道制止，路上有饿死的人而不知道赈济，人死了反而说‘与我无关，是年成不好的缘故’，这和把人杀了却说‘与我无关，是武器杀的’，有什么不同。大王不要怪罪于年成不好，那么天下的民众就来投奔你了。”

【段意】孟子认为，梁惠王的办法不能说一无是处，但还是没有在根本问题上着力，所以用“五十步笑百步”的例子来打比喻。梁惠王关注的中心问题是如何才能使更多的民众来归顺他，孟子因势利导地讲述了“王道”的政治、经济措施。孟子认为，要称王称霸，首先必须得到民众的拥护，而做到这一点的起码条件是民生有保障，这就是文中所说的“生、死没有缺憾，是王道的开端”。孟子在此所规划的施政措施，概括起来是两条：一是使百姓富庶，二是要对他们进行伦理道德教育。这与孔子所谓“富之”（先使民众富庶）、“教之”（然后要对他们进行教育）的观点（见《论语·子路》篇）是一脉相承的。宋代理学家程颐说：“孟子之论王道，不过如此，可谓实矣。”（朱熹《集注》引）

1.4 梁惠王曰：“寡人愿安承教。”^①

孟子对曰：“杀人，以梃与刃有以异乎？”^②

曰：“无以异也。”

“以刃与政有以异乎？”

曰：“无以异也。”

曰：“庖有肥肉，^③厩有肥马，民有饥色，野有饿莩，此率兽而食人也。^④兽相食且人恶之，为民父母，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，恶在其为民父母也？^⑤仲尼曰‘始作俑者，其无后乎’，^⑥为其象人而用之也。如之何其使斯民饥而死也？”

【注释】①安：安心、乐意。 ②梃：木棍。刃：刀。 ③庖：厨房。
④率：放任。一说，率作率领讲。 ⑤恶(wū 乌)：何，疑问副词。 ⑥仲尼：孔子字仲尼。俑：古代用于殉葬的偶人。后：后裔。朱熹《集注》云：“古之葬者，束草为人以为从卫，谓之刍灵，略似人形而已。中古易之以俑，则有面目机发而大似人矣。故孔子恶其不仁，而言其必无后也。”其实，古代是先有活人殉葬，尔后才以俑来代替的，孔子不知道这点，所以作此感叹。

【译文】梁惠王说：“我愿诚心诚意地接受指教。”

孟子说：“杀人，用木棒和刀剑有什么不同？”

惠王说：“没有什么不同。”

孟子又问道：“用刀剑和政治手段有什么不同？”

惠王说：“没有什么不同。”

孟子说：“厨房里有肥肉，马厩里有肥马，而民众却脸带饥色，野外有饿死的人，这是放任野兽去吃人。野兽相互吞食尚且为人所憎恶，作为民众的父母，施行政事却不能避免放任野兽去吃人，为民父母的意义何在呢？孔子说‘发明造俑的人，大概会绝灭后代吧’，因为它模仿人的形象而用来殉葬。怎么能如此使民众饥饿而死呢？”

【段意】此章承上章而言，梁惠王听了孟子的一番话后，心有所动，要求孟子具体指出自己施政的弊病。孟子尖锐地指出，惠王的治国等于是“放任野兽去吃人”。

1.5 梁惠王曰：“晋国天下莫强焉，^①叟之所知也。及寡人之身，东败于齐，^②长子死焉；西丧地于秦七百里；^③南辱于楚。^④寡人耻之，愿比死者壹洒之，^⑤如之何则可？”

孟子对曰：“地方百里而可以王。^⑥王如施仁政于民，省刑罚、薄税敛，深耕易耨；^⑦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，入以事其父兄，出以事其长上，可使制梃以挾秦、^⑧楚之坚甲利兵矣。彼夺其民时，使不得耕耨以养其父母，父母冻饿，兄弟妻子离散。^⑨彼陷溺其民，^⑩王往而征之，夫谁与王敌？故曰仁者无敌，王请勿疑！”

【注释】① 晋国：朱熹《集注》云：“魏本晋大夫魏斯，与韩氏、赵氏共分晋地，号曰三晋，故惠王犹自称晋国。”魏在战国初年曾因革新变法而称强一时，故此处谓“天下莫强焉”。莫强，犹言没有强过它的。② 东败于齐：魏惠王三十年（前340年），魏发兵攻韩，韩向齐国求救。齐派田忌、孙臧率军攻魏救韩，两军在马陵（今河南范县西南）交战，魏军中计大败，将军庞涓自杀，统帅太子申被俘（下文的“长子死焉”即指此）。魏国从此一蹶不振。③ 西丧地于秦七百里：马陵之战后，魏国遭到齐、秦、赵三国的围攻，魏国在向秦国反攻时被商鞅统领的秦军打得大败，将军公子卬被俘。后来又多次败于秦国，魏国被迫割地求和，黄河天险尽入秦国之手。④ 南辱于楚：据《战国策·韩策》和《史记·楚世家》的记载，梁惠王后元十二年（前323年），楚国为了迫使魏国倒向它，插手魏国的王位继承，派柱国昭阳在襄陵打败魏军，夺取了魏国的八座城邑。⑤ 比死者壹洒之：